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四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一四期 ——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7d)

- | | | |
|--------|----------------------|---------|
| 【本刊专稿】 | 文革“全国第一夺” | |
| | ——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上） | 余汝信·曾 鸣 |
| 【史海钩沉】 | “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 徐海亮 |
| 【往事回首】 | 江青为我改名记 | 杨银禄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上）

· 余汝信·曾 鸣·

发生在近四十年前的1967年山西省1月12日夺权（简称一·一二夺权，以下同），是当代山西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也有着重要影响。在首先由上海掀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中，先后被夺权的省、市、自治区有：山西（1月12日）、江苏（1月13日）、北京（1月18日）、吉林（1月18日）、广东（1月22日）、河北（1月23日）、广西（1月23日）、陕西（1月25日）、贵州（1月25日）、新疆（1月25日）、云南（1月26日）、湖北（1月26日）、江西（1月26日）、安徽（1月26日）、宁夏（1月27日）、青海（1月29日）、辽宁（1月31日）、黑龙江（1月31日）、湖南（1月）、河南（1月）等。从时间顺序上看，山西是第一个夺权的省份，堪称“全国第一夺”。而且，山西的一·一二夺权是由省委、省人委的少数干部与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在山西省军区的支持下，实行军队、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与群众造反组织“三结合”的夺权，这是山西夺权无意中首创的“经验”，它对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在夺权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与方式方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它和“三结合”夺权形式大同小异的贵州、黑龙江以及稍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革命委员会），得到了毛泽东与中共高层的率先支持和批准，也就不足为奇了。（1）

但是，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称一·一二夺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是全国的“榜样”和“旗帜”，〔2〕“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3〕直至指认一·一二夺权“是林彪、康生、江青、王力、关锋等直接策划的篡党夺权的组成部分”。〔4〕这种反差极大的评判发生在当代中国本不足为奇，惟作为后人研究历史、评价历史，应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点，对一·一二夺权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少数人的谴责和声讨，而要把它放在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才能有一个科学的看法，以汲取教训警示后人。从总体上看，山西省的一·一二夺权，发轫于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发端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它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行动，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个别行为，更谈不上是什么“反革命夺权”。〔5〕

本着述而不作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本文拟对一·一二夺权的前因后果及经过作一叙述，以期对文革研究有所裨益。

为了把一·一二夺权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我们不妨把视野延伸至文革前中共山西省委（以下简称为山西省委或省委）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省情的一些方面。

一、文革前的山西省情和山西省委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以东，华北平原的黄土高原，东以太行山部边缘为界与河北省接壤，西部、南部隔黄河和陕西省、河南省相望，北出外长城同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而又因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全省大部分地区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系晋国领地，故简称“晋”。总面积为156,266平方公里。文革前的1965年全省总人口数为1871.56万人。〔6〕

抗战时期，中共先后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区建立了晋察冀边区（辖北岳、冀中、冀东、冀热察等区），在山西和绥远省交界地区建立了晋绥边区（辖晋西北、雁门、大青山等地区，一度时间内包括晋西南），在山西、河北、河南交接地区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区）。中共在这几块根据地分别建立过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成立过中共省委或区党委，成立了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以及各行政区行署，也成立过大军区和二级军区。此种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1949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颁令撤消太行、太岳、太原市（省级）等区，确立山西省建制，各区党委和行署、二级军区等领导机构随之取消。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山西军区和省级群众团体的干部，以来源于原晋中、太行、太岳的干部（晋中736人，太行683人，太岳394人）为主，也有晋绥和晋察冀的部分干部。从此时起到文革前的1965年，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委干部虽屡经变动，但就领导层而言这种格局基本未变。从1965年8月新产生的中共山西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构成来看，21名常委中有太行区履历的干部8名，有太岳区履历的干部5名，有晋绥区履历的干部2名，有晋察冀区履历的干部2名，中央派来的干部2名，省军区干部2名。当时省委设有书记处，共有7名书记（不含第一、第二书记），其中太行区履历干部4名，晋绥区履历干部1名，晋察冀区履历干部1名，中央派来的干部1名。第一书记卫恒原系中共太岳区党委秘书长（1945—1947），长期在太岳区工作，第二书记王谦原系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部长（1949.5—1949.8），长期在太行区工作。从整体上看，中共山西第二届省委班子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但在处理日常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中，原太行区干部显然占有优势。

从1965年12月省人民委员会正副省长的根据地履历来看，省长王谦如前所说是原太

行区的干部；11位副省长中，原太行区干部2人，原太岳区干部3人，原晋绥干部1人，原晋察冀干部2人，中央派来的干部3人。由此不难看出，原太岳区干部在副省长中占的比例稍高。其时，山西省设有5个专区：雁北、忻县、晋中、晋东南、晋南专区，与之相对应设立有5个地委；省辖市（即地级市）4个：太原市、大同市（雁北专区代管）、阳泉市（晋中专区代管）、长治市（晋东南专区代管）。全省共有96个县、10个市辖区。各地委、市委和专区、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中，有原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的干部，他们交叉任职，太行、太岳两区干部占多数。截止到1965年，全省共有党员总数619,609名，干部总数205,059名。（7）

1965年，省内高等院校有山西大学、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前身）、山西医学院（今山西医科大学前身）、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前身）、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师范大学前身）、山西矿业学院（后并入太原理工大学）、太原机械学院（今中北大学前身）、太原重型机械学院（今太原科技大学前身）、山西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今雁北师范学院前身）、晋东南专署医学专科学校（今长治医学院前身）、大同医学专科学校（今大同医学院前身）等12所高校，共有在校学生14,132人，教职工6,380人。（8）到文革前，又先后设立了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山西农业劳动大学。

综上所述，山西省、地市两级领导骨干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根据地的履历，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正因为山西省委的多数领导人有着根据地履历，所以他们和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薄一波、杨尚昆、李雪峰、安子文等长期在山西工作过的中共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工作联系。加之，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山西。从1950年至1965年多次作过批示和指示，肯定山西的工作。特别是毛泽东1965年5月10日至11日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时提出，要像山西昔阳县的大寨那样自力更生搞农业生产，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9）同年6月毛泽东还说，搞农业要靠大寨精神。（10）从而拉近了山西和中央高层的距离。在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调回北京任职前后，中央对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继任人选几经斟酌，方确定了由卫恒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1914年5月生于山西省陵川县沙泊池村，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共。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年方51岁，在当时的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在资历方面属于抗战时期参加工作并入党的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和那些在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同志相比，显然是后来人。但是高层认为，卫恒任省委第一书记是选得中的。（11）

从1957年开始，由于领导上的左倾错误和个人专断，政治运动不断，反右扩大化，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山西省党组织在有的重大问题上未能从实际和人民利益出发，执行左的一套。1957年反右斗争中，全省竟有10,241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10,113人系党和国家工作人员，（12）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拔白旗插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居然有295,791人，尽管不久为其中99%的人甄别平反，（13）但在文革中他们又遭厄运。1959年中共山西省委批转省农业建设厅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作物安排的报告”提出了粮食总产量285亿斤，棉花产量6亿斤，油料产量4.5亿斤等一系列高指标。这在当时来说，无论从人民的承受能力来说，还是从客观条件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为实现这些指标，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去达标。推行一大二公，强迫命令，弄虚作假，一平二调的事情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当年粮食实际总产量为81.5亿斤，当年财政出现赤字2,877万元。棉花、油料等指标也远未完成。虽然经过后来被称之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山西经济有所好转，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落后局面。

山西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依据中共的组织原则，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

示的。但并不排除个别领导人私下曾对这些指示本身提出过质疑。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卫恒在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前就在私下称：“人民公社是十月怀胎、七死八活的早产儿”，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公共食堂民有怨言”，并建议时任第一书记的陶鲁笏向中央反映这些问题。（14）卫恒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大任还对八届八中全会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并且对此事要保留意见。（15）或许，由此可以窥见到卫恒、王大任等人文革初期被夺权被打倒的历史原因所在，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不过是原因之一。

总体地说，中共山西省委没有理由不紧跟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但是，当跨进1966年以后，中共山西省委的步伐实际上却越来越跟不上他们信赖的领袖毛泽东的步子了。原因何在？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二、1966年上半年的山西政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春天，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的批判密锣紧鼓，一阵紧似一阵。对翦伯赞等著名学者的批判火力也越来越猛。面对这种情势，山西省委的态度如何呢？同年5月3日，省委在呈送华北局并报中央的“关于学术批判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如是说：“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吴晗等人的学术批判，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这场斗争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认识不足，嗅觉不灵，见事迟、行动慢，因而没有把这个问题摆到省委的主要议事日程。自从《人民日报》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五个多月来，中央一级报刊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资料，《山西日报》、《太原晚报》虽连续转载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对有些文章，未能及时转载，当时并未引起我们省委的重视。今年二月间接到《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省委宣传部于三月三日召集了省直文教各部门及高等院校党的负责同志，传达、讨论了中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针对吴晗、翦伯赞、夏衍、田汉等人的问题，开始了学术批判活动。到四月上旬，全省约有八百余人参加了这场斗争。省剧协组织戏剧界讨论了四次；山西大学文科各系讨论了二十余次，他们成立了六、七个专题讨论小组，写出了三十余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经见报。山西师范学院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文科各系占用了一部分教学时间，进行学术批判活动，青年学生写了不少文章。”不难看出，山西省委把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吴晗等的批判看作是一场学术批判。显然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南辕北辙。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山西省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有所变化呢？诚如上述报告指出的那样：“四月上旬华北局邯郸会议，传达了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场斗争是现阶段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16）有了这种认识与态度，“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在1966年4月20日召开省直文教部门、统战部门和高等院校党组织的负责干部4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听取了汇报，检查了山西省前段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卫恒同志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同志，就省委前一段时间内没有把这个问题纳入主要议事日程，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对山西学术批判运动领导的具体意见：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及各有关单位党组织，都要把领导开展这场学术批判运动列为主要议事日程之一，定期研究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培养新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都要有计划地发动与组织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机关干部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一方面要紧跟全国学术批判发展的形势，积极参加对吴晗等人的批判斗争；另一方面要立即着手清理问题（包括吴晗等人来山西讲学中的问题），把本省文、史、哲、法、经、教等方面在政治、学术观点上的错误的人，按人整理材料，经省委批准后，进行重点批判。”（17）

省委还从组织上加强了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王大任组长的省委学术批判领导小组，成员有史纪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卢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李慰（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象（山西日报总编辑）。省委要求各地、市、县委都要在常委领导下，指定一名副书记专管此项工作，建立相应的办公机构。省委又下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建立机构，开展工作。

会后到4月底的10天时间里，在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单位召开了座谈会160余次，参加的人数达两千余人。《山西日报》、《太原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青年报》等报纸在这10天内共刊登批判文章70余篇。这说明，省委确实是有意紧跟中央的部署。为此，不惜把山西大学一位教授说的“对吴晗的批判，是雍正的文字狱”称为“敌对情绪”开展批判。（18）

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是异乎寻常的，经常使他的同僚和下级赶不上趟。就在山西省委认真开展学术批判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政治局内动大手术：5月4日至26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把本来互不相干的彭、陆、罗、杨四人生拉硬扯在一起，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6日，通过了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正是这个通知，为山西省委被夺权、它的领导人被打倒提供了依据。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9）

当时读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文字，足以使中共高级干部中许多人不寒而栗。然而，长期以来，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没有错误也不会发生错误，一切以毛泽东讲的是非为是非，毛泽东说对，就对；说错，就错；即使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毛泽东相左，也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薄一波这位资深革命家的一位老领导、老战友告戒他：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20）这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悲剧所在，也是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悲剧所在。

由此人们可以理解当时山西省委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1966年5月19日，山西省委决定将学术批判领导组改为文化革命领导组，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仍任组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卢梦任办公室主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和宣传部副部长李慰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月21日，山西省委就坚决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向各地、市、县委发出紧急通知。内称：“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文件。各地接此通知后，必须立即在县委委员、省直各厅局党组（党委）成员和各厂矿党委委员中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各地在学习和讨论中，除对通知的内容要反复学习，领会精神，并且检查自己的认识、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外，对于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一根本错误的文件，必须严肃地深入地进行批判。”“各地党委学习和讨论的情况和反映，应当及时的书面报告省委。”

上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第17天的时候，当时代表中央领导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述直辖市委、省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地委、市委书记，盟委书记和部分县委、旗委、

区委书记。山西省参加这次会议的负责干部共198人，除留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在太原主持省委和省人委日常工作外，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地、市委书记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与部分县委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华北局这个中央派出机构在文革初期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但也是最后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在这次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都受到揭发批判，不久即被撤销职务。山西则不同，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常务书记王大任都未被触动，他们只是检查了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错误”。但是，对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21〕在会议期间太原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则集中火力进行了批判。原因是袁“诬陷省委”，在有些问题上说假话等。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指示要对袁振进行严厉批评，使袁振在会议上的发言成为华北局工作会议山西组重点问题。

会议期间，省委还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22）强加给王中青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蒋家王朝的孝子贤孙”、“漏网大右派”、“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等等；强加给赵树理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叛徒”等等；给李束为强加的“罪名”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撤销其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文联主席的职务。可见，当时省委领导人紧跟毛泽东部署，在处理所谓“三反分子”问题上是不心慈手软的（尽管后来王谦谈到批判王中青等人是“上压下挤”的结果，但是笔者以为起重要作用的还是当时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因素和大环境使然，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悲剧。“上压下挤”之说似有开脱自己之嫌）。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在中共未执政时就为党从事统战与隐蔽工作做出贡献的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因不堪这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折磨，于1966年6月22日跳楼身亡。时隔不久，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萍也因对这场运动不理解上吊自尽。（23）在不少大中学校和文艺单位也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也受到批斗。

华北局会议一结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委其他负责人急忙返回太原召开小会或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华北局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山西的文革运动，力图紧跟毛泽东搞好这场运动。但是，由于毛泽东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给山西全省和高校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太原五中、太原六中等大中学校的学生起而效仿，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即成为“炮轰”、“打倒”的目标。有些学校乱批乱斗，不少学校被迫停课。对此，省委规定：“不准大字报贴在校外”，“不准在大字报上随意点名批判”，“不准随便批斗”，“不准张贴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不准跨校召开批斗大会”，“不准侮辱人格”，（24）力图把运动引入以往政治运动那种模式之中，但是这些规定效果甚微。

6月6日，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大字报称“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请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7月16日，省委作出《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站在运动的最前面，加强领导，坚决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25）同日，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传达了这个文件。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机关、高等院校17级以上的干部与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18日，省委以湖滨会堂为主会场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以及书记处书记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等人出席了大会。卫恒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目的和意义”；“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当真正的革命左派”。报告称：“现在我们所进

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26〕报告反映出山西省委和卫恒对本省文革的基本思路。在各分会场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省直机关和高等院校共75个单位的两千一百余人。20日，《山西日报》以第一版整版并转第二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次大会。但是在18日中共太原市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袁振作动员报告，却声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27〕与卫恒的报告形成极大的反差，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混乱。

三、1966年下半年的山西政局：内外交困的山西省委。

自湖滨会堂大会之后，山西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省委的安排和卫恒报告的精神，开展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挖个人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和伸手派，形成了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局面。此期间省委以“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为由，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

从1966年7月25日至12月16日，山西省委作出45项决定，撤职、停职反省的领导干部共49人。其中撤销职务的11人：赵光亨（山西财经学院副院长）、窦凯（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徐志远（中共忻县地委书记）、杨国祯（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院长）、王声（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副院长）、何象履（长治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胡之江（阳泉市副市长）、赵宗复（太原工学院院长，并被开除党籍）、郁世仁（太原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束为（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庞湘川；停职检查或停职反省的有38人：贾晨林（中国科学院燃料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奇（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弓宏（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王忠（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黄石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庶民（山西省文化局局长）、陶健（山西省公安厅厅长）、石峰（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立远（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兰亭（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隽轩（山西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冯瑞如（山西省民政厅副厅长）、宋志先（山西省劳动厅副厅长）、赵德（山西省邮电局副局长）、鱼波（西北一八二队党委书记）、林南（山西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西戎（山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塞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阎玉生（山西省储备局局长）、冯毅（山西省教育厅厅长）、解玉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贾克（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赵向荣（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成江（山西省地质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刘景山（山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黄清池（华北工业卫生所副所长）、郝剑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分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崔晓天（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李子康（山西大学副校长）、陈飞（山西省机电设备成套局副局长）、李进军（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蒋方宇（中条山有金属公司党委书记）、刘敏（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康振锋（山西省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卫逢祺（山西省副省长兼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刘梅（山西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华青（山西大学党委委员、秘书长）。其时，中共太原六中支部书记李雪明、校长冯培云与教师解华和中共忻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程友三、党委宣传委员高云伟与教师冯陶民也因文革问题受到处理。上述人员中，李束为、刘梅、宋华青、李雪明、冯培云、解华、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还被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判。

正当山西不少单位按省委的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之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并非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卫恒，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全会。这是卫恒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下同）；批准了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提出来的一系列决策，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从而改变了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在中共中央的位置。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作为全会文件印

发。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经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强加给了全党全国全军。由于条件限制，笔者至今未看到卫恒、王谦等人当时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想法和看法的文字材料。

卫恒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赶回太原传达会议精神。8月12日省委发出通知，允许高校师生在校际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访问，召开座谈会。显然，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鼓舞了大多数青年学生的“革命勇气”，他们想要紧跟毛泽东的部署，成为“勇敢的闯将”，于是“就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业学院和山西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生组织起星火战斗队、炮轰组到中共太原市委造反，张贴出一批关于“傅山画集问题”、“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和“炮轰贾俊”、“赶走工作组”的大幅标语。

面对此种情况，山西省委仍是引导学生走上传统的轨道。继毛泽东身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以后，山西省委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了有15万人参加的“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山西省军区、驻晋部队的领导人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省委书记处书记）、焦国鼐（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开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日清（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胡炜（陆军第21军军长）等出席了大会。卫恒在大会发表讲话，要求“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在辩论中要善于独立思考”，“决不轻易附和”。卫恒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当前，我们革命师生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斗二批三改，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进一步亮明了省委的政治态度，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照十六条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28）

但是，形势的变化再次出乎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意料和安排之外。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补助生活补助费，外地学生到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山西的大批学生蜂拥北上，直奔北京。北京的学生则乘机到了各地，其中不少人来到太原和山西的部分城市。仅太原一地，就有北京等外地学生10万人之多。太原市的全部招待所、旅店、澡堂、影剧院成为外地来并学生的食宿之处。（29）山西省委成立红卫兵接待站，专司接待省外来太原串联红卫兵衣食住行之责。来太原的外地学生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部分红卫兵和中学生。他们中的部分是文革刚开始的“保皇派”，有的是保工作组派，有的则是根据所在院校红卫兵安排来山西造反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他们一踏上山西这块黄土地，就参加到“革命造反行列”，不久便组成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等造反组织，和山西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炮轰山西省委及其领导人。

9月11日，太原五中的一名高中学生刘灏张贴出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这是山西第一张指控卫恒这位省委第一书记为“黑帮”，指控山西省为“黑线”的大字报。作者在大幅报中还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称“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同月16日，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的部分红卫兵联合成立了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行动口号是“炮轰卫恒，支持袁振”。这个组织的部分成员于19日占据山西省第一招待所，把卫恒拉到这里辩论袁振问题。

对此，山西省委在《山西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欢迎赴京参观取经归来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的文告，强调要按十六条办事，“凡是符合十六条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一切违背十六条的，

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30〕显然，山西省委在党报上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捍卫十六条，意在抵制和反对群众中把矛头对准省委的言行。但是，他们恰恰忘记了十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在第三部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中指明：“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撤销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31〕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继续和发展，和《二十三条》一脉相承，它的要害是罢官和夺权，就是要把被毛泽东认为是刘邓司令部的那些“走资派”整垮，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十六条其他条文都是为这个重点服务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来说这就是“革命的大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十六条不仅不能把运动纳入省委意图和常规范围之内，反而加速了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炮打省委及其领导人的过程。山西省委的多数领导人既然不愿落一个“压制民主，压制群众运动”的罪名，只能是疲于奔命，应对这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运动。不过，省委有的领导人对这种行动颇不以为然，有过一定程度的抵制。〔32〕

然而，令山西省委及其领导人更始料不及的是，又一个严重的政治灾难正在降临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国庆17周年大会上，接见来京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大约150万人受到接见。林彪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33〕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根据林彪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紧急指示》还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10月24日，山西省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代表省委作动员报告。其实，已经无须动员。《紧急指示》一经宣布，不胫而走。在山西、在全国，掀起一股“抛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军、省军区系统、工厂、矿山、农村外，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各级党委先后被冲击，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里“整群众的材料”的言行铺天盖地而来。霎时间，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的人们感到解放了，纷纷起来清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在山西省城，不少人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纷纷成立造反团体。较大的组织就有95个。这里仅举出一些当时影响大、能量大的组织：星火战斗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太原重型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小组、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以后发展为永红司令部）、太原市红卫兵联络总站、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省委党校东方红、山西医学院革命造反队、太原冶金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太原十二中东方红、太原会计学校井冈山、山西大中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下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前身系炮轰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太原纺织厂红卫兵、太原纺织厂红卫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团、百万雄师、工人联

合会、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北京航空学院播火兵团、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山西日报社革命造反军等，录以备考。但是，省委领导人对这种“革命行动”仍然是很不理解。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打通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了两件事：一是历史，中央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一件事，他如是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34〕但是，毛泽东对常委分为一线、二线造成的结果是不满意的：“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说自己“过于信任别人。”〔35〕关于第二件事即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36〕他谈到文革形势时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37〕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对山西省委冲击的势头更猛了，冲击面更大了。不仅要打倒党内走资派，而且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组织的队伍迅速扩大，对社会现状存在有这样或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动中来。合理的与不合理的要求混杂在一起提了出来。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

11月2日至19日山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造反组织要求解散会议秘书处，另立秘书处。同月8日，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和当天刚成立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共数百人将卫恒拉至山西省第一招待所进行辩论，然后要其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八项要求是：一、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二、交出整群众的所谓黑材料；三、造反组织召开的批判大会，卫恒必须随叫随到；四、宣布贾俊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不合法的；五、撤销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联络员和没有卫恒的“卫恒”（意指卫恒的代理人——引者注）；六、为被整的群众彻底平反；七、广播车应由造反派调用；八、各造反兵团在省委设立联络站。对此，卫恒给出六点答复：一、对八项要求，我无权答复，省委也不能答复；二、迅速地积极地为被整的群众平反；三、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材料不能给；四、11日以前撤出派驻太原市委的全体工作人员，贾俊除外；五、要求撤销贾俊职务由省委研究，10日前再给答复；六、录音机去购买，时间不能马上定。他们还要求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大会，与卫恒在大会上“辩论袁振问题”，让参加三千会的人员参加。并要卫恒在为此事已经拟好的《海报》草稿上签字。9日凌晨卫恒签字。稍后，省委有的领导人对卫恒提出批评，指出在《海报》草稿上签字是错误的。卫恒随即于10日发表《关于十一月九日〈海报〉声明》，称：“以个人名义同学生签定《海报》是错误的，希望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

但是，造反组织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当即发表声明重申要继续和卫恒辩论。10日下午他们在五一广场集会，将卫恒带到会场，高呼“打倒土皇帝卫恒，解放全山西”的口号。现场一部分人见状十分不满，呼着“要文斗，不武斗”的口号，涌上主席台与主持大会及看押卫恒的造反组织成员辩论，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卫恒？造反组织离开会场。11月20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等组织的几十人，再次找到卫恒进

行“辩论”，长达17个小时。强烈要求卫恒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后改为“八项协议”）上签字。卫恒最终签字。此举可以理解为特定条件的非常之事，因为当时有个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虽然华北局指出签字是错误的，但在群众压力下卫恒当时不能不签字。值得注意的是，省委的少数常委竟以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鼎、史纪言等八人名义，于22日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写报告，称“卫恒同学生签署的‘八项协议’有许多是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并建议撤换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38）这种撇开省委第一书记和多数常委，联名写报告的行为实属罕见，实际上是在卫恒的背后捅了一刀！这一点恐怕当事人在那时似乎也有感觉，所以在当日即1966年11月22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以八人联合报告作为省委正式报告，使之合法化。这就是省委221号文件和省委223号文件出台的背景。（39）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到会的常委14人，除上述8位常委参加外，卫恒和其他5名常委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是“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会议决定：一、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二、今后不准以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省委常委理应团结一致应对混乱局面。但是却对卫恒的签字横加指责，实属一个失误。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10月26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等7个造反派组织的部分人到省委机关围攻王大任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长达12个小时，迫使王大任、武光汤在他们提出的“协议”上签字。“协议”的主要条款是：立即给受害群众平反；不准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追究打击迫害群众的干部的责任。省委还将此“协议”印刷3万份，发至全省各地。为什么王大任、武光汤在“协议”上签字，省委常委对此毫无反应，卫恒签字却引起常委内部如此反弹，两相比较，岂不发人深省吗？

此时的卫恒和省委多数领导人内外交困，处境十分艰难。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中共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造反派批斗后突然不知去向，几天后在水井中发现其尸体。但卫恒等省委领导人仍在履行书记处的职责。根据华北局的指示，省委决定分别设立一、二线两套班子，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贾俊等人为一线班子，主要负责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赵雨亭、刘开基为二线班子，主要负责抓工业农业生产并了解面上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省委要求各地、市委也设立一、二线班子，保持省委与下级的联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风暴向他们袭来。

（未完待续）

~~~~~

【史海钩沉】

“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 徐海亮 •

## 6、开始整肃左派

毛泽东已经看到批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务。而且，群众背后有黑手，群众里混有坏人、反革命。在当年视察大江南北是，毛也指出：“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并多次讲到到次年结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还说要改变黑暗面才搞文革运动，“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39）

不过在1967年8、9月，毛泽东未必把司令部内的问题看得这么严重。而且造反派群众的左倾思潮，没有超出毛泽东的理念的底线；具体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风暴雨的群众实践中，往往是中国式的游民文化和类布朗基、蒲鲁东主义者（40）的文化成了气候。这些自然是与主张马列主义政党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与关锋在“请假检讨”中，也仅仅承认自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戚本禹则检讨了三点错误：1．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力、关锋住在钓鱼台二号楼，起居照常。

特别是，毛泽东9月7日在戚本禹的检查上还批示转告王力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41）。说明当时毛也并未一棍子打死王、关，还属于文革初期讲过的“左派整风”范畴。比较能够显示毛泽东内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于9月24日去打听消息，毛泽东只是引了罗隐悼念诸葛亮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出后，仅仅理解为王、关完蛋了。（42）其实，政治诗人毛泽东并不简单比喻“武汉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当一切早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一些当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测8月剧变时伟大哲人的内心世界，“他究竟说的什么”？王力与关锋都坦承毛的“英雄”不是比喻他们或惋惜他们，毛泽东是比喻的他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风云的英雄毛泽东，面对武汉事件后变幻的形势，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孤独和不自由。尽管此后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宏愿。

或许，毛泽东8月4日给江青的信，并不如今天庸人们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左倾盲动，可能7、8月全国全面内战，反而激发他怀念法国革命和中国大革命，引发他对巴黎公社武装民众和大革命武装工农的理想与史实的追念。但7、8月的左倾与热月，文革的出轨和反对，时世与愿望大相径庭，他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诸葛亮。研究者说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有四次抄写和咏吟该诗，为什么在他视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之时，吟出风雨独行、无可奈何情怀的诗句？可能这恰恰是他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目睹乍热乍寒，却不能扭转文革日渐趋下之势，发出的英雄长叹。（43）

在武汉事件后运动迅猛发展、变化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文革小组的配合他也感到并不理想，可能是适得其反。

处于第一线的江青，当然也在8月中央宣传口径和政治急变中，感悟到什么问题。所以她在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时，还派姚文元去上海探听毛的底，发牢骚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汇报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44）姚文元传回毛泽东的话“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陈伯达慌了神，文革小组内讧起来；司令部高层的内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级了。解决小组的问题出现一个机遇。

同时，出现值得深思的问题：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头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无不敏感难以驾驭的造反运动和调查历史与过节的阴云，已经威胁着他们自身的政治安全，他们都在不同场合（甚至面对身边工作人员或红卫兵），声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历史和政治问题，小到鸡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和年轻干部，警觉他们背后的“政治黑手”。文人相轻和权臣争宠的庸俗陋习，被带入本应十分严肃的党政高层政治生活。诚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出现这种政治局面，也应负有

主要的领导责任。从“安亭事件”以后，一直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步伐——备受批评的陈伯达，权力与声誉式微，但又拼命想巩固地位、职权。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畴，防范着少壮激进者可能的揭发告密，暗暗组织阻遏和弹压。这是个大家推进了这个思想激荡，也被脱缰的群众运动和诡秘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时期。也是一个文革整体性悲剧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文革派风云人物被整肃，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区的左派大将陶铸、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说过不怕被人怀疑打倒的大话。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类似雅各宾恐怖的荒谬和讽刺。“怀疑一切”与“警惕一切”的恐惧充斥了人们向往的红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园”。陶铸在一年前许诺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炮轰，成为不可遏止的政治实际。

此外，也由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分歧，领导人各自暗示或公开支持一个学校、一个派别的学生组织，北京的左翼红卫兵运动出现了灾难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众里的各种冲突，透露了高层的政治纷争。

8月11日，在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的关键讲话里，陈伯达和江青都公开点明“5·16”问题，强调它是反总理的。从而也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全国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导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绝大荒谬。荒谬当然不出自所谓“刘邓陶”，也不出自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文革司令部的裂痕，从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发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对立。文革的彻底失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从文革司令部内部猜疑开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内部纷争。如果说1966年清洗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还只是一种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斗争，并延伸到群众中，是文革运动开始衰竭的重要标志。从动员和鼓动群众投身这个政治运动，转化为节制群众、规范群众，以至收拾群众运动。大家似乎都后悔把群众从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来。从此，文革运动从不整群众，转换到也整群众（所谓群众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论与组织准备不足，文革的终极对象的混乱、飘逸，传统的政治文化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武汉群众不久就领教了“林副主席派来的”军区新领导和支左军人的“路线觉悟”，有人感到他们甚至比陈再道们对群众更不感兴趣！造反派与掌握实权的军人的冲突，已是必然。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武汉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的东西，并不如一个“五·一三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天安门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武汉事件”的真实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不力；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45）。

1966年，林彪对于军队参与文革运动，总的讲处于一个守势，他并不情愿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军队参与和支左的要求，实质是对林而非对其他老师的批评。可以说林总和其他老总相比，对于文革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林系的将领（如“四大金刚”等），并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军人更有“文革的路线觉悟”。军队投入支左以后，矛盾更加复杂尖锐，甚至出现规模性的流血事件，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毛泽东在应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阻遏时，并不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从武汉事件开始显示出来。林彪说过一些大话，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并不能起到人们期盼的文革“副统帅”和“尊神”“钟馗”的作用。

就在67年5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试探邓的态度——能否出来工作？邓认为时机不宜，毛让他找林、陈谈谈，邓也不愿意。当时正是批判刘、邓的高潮时期嘛。（46）在1967年春运动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在林彪的政治态度和身体状况都不理想时，找邓小平谈话仅仅是一个偶然吗？仅仅是因邓在4月要求过见主席吗？有关联的是：就在武汉东湖之时，毛泽东于7月15日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王力认为，“当时主席已经对林彪不满，流露出想用邓小平换林彪的意思”（47）。王力这两句讲的总还是事实，还不至于蓄意抬高邓小平。

毛、林在文革问题上相互不信任，恰恰在武汉事件后露出了蛛丝马迹，杨成武公开的系列回忆多次流露出来了一些迹象，仅作为一种参考。林彪在67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抢枪问题，毛给江青的信说“并不严重”；随之，林又主张起草严禁抢夺枪支的通告，由总理去商办。林与毛对事件后的形势估计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会上，也说“军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好人”。之后，一反亢奋状态，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实思想和主张，还是怪异诡秘的。

不过，正是武汉事件以来，足以显示林影响军队运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军队文革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决定作用（“513事件”是一个标志，“7.20”后“三军无革派”则影响了全国）；军委看守小组转变成军委办事组。在支持武汉和维护军队稳定的一个大旋回中，林系军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里坐大的局面，的确发展了。被周恩来挽回的党政官员体系，想收回在运动初丧失的权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风云人物的犹疑，也在这时发展到一个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存在总体失望，早在67年五一节就讲了。其后，才产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想法。

特别是，经过了热月，毛泽东9月在武汉又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他一再要身边的军政官员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大学生们到了1968年7月28日后，才慢慢明白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想结束红卫兵运动的征象，从“武汉事件”以后业已明显出现。周恩来通过一系列促进大联合，审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员会，落实干部政策，加快了收敛与结束文化革命的步骤。不过，尽管出现热月，王力被软禁，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当年中共中央对武汉事件的基本态度，并不因为王力而祸及武汉；他也对武汉造反群众充满热忱，帮助和调教他们，他审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吸纳了一批激进的群众成员。不过，湖北的造反群众尝到热月的苦果，或许推迟了一年。

8月4日，毛泽东与江青写信要求“武装左派”，整整一个月后，中央颁布扭转形势的“九·五命令”，并由同一个江青出面讲话，动员群众，从自以为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派手里收回流散的武器。舆论一再宣扬“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鼓动学生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

不过，文革的急剧转向，文革小组激进文人的更迭，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核心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么，他们的理论家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绕过了暗礁。进而，在9月14日、17日接连抛出大字报攻击陈伯达，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推行极左路线。“武汉事件”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概括的理论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开始得到了它的精神成果。

广大群众并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经转向了。

快40年了！似乎仍然难以理解它——紧接着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变之后，文革历史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文革历史而言，这里的“不能随心所欲”包括广大热心投身于运动的各派群众，也包括“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

注释：

（1）独立师某部战士揭发（1967年8月）。

（2）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19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奉命送信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但一些人回忆的时间不确，顶撞总理不是在15日、18日，而是在16日。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指责16日陈顶撞周总理、拍桌子。

（3）钟汉华政委在事件后检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文献，1967年12月。

（4）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

（5）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武汉事件资料汇编”，河南二七公社、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1967年8月。

（6）中共“九评”讲的无产阶级专政15条经验教训，有一条就是讲人民军队必须坚决在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

（7）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5、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8）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9）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4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周恩来对“北航红旗”红卫兵井岗山同学所言（1967年7月22日）。

（11）《毛泽东传（1949—1976）》，15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出自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原话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

（13）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参阅《“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公司，2003。

（14）部分群众的认识，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分析，也受到“清华井冈山”核心的极左判断的影响。

（15）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一直在地下或公开活动为“百万雄师”翻案的人，宣传有18万以上阶级兄弟被造反派殴打或打死；1978年湖北当局为“720事件”平反，直接援用了这一来自民间的夸张数字，上报中央。

〔17〕在八月上旬，周恩来一再批评的江西抢枪行为，基本上是保守的一派的。中央决定在江西试点武装左派。南昌、赣州、吉安、萍乡、抚州、向塘都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抢夺武器事件。

〔18〕8月7日，周恩来指出：（湖南）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

〔19〕8月20日，河南刘建勋对造反群众说：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治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

〔20〕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1〕王力，《王力反思录》，853页，北星出版社，2001年。

〔2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32页，引自周恩来的摘记手稿，明镜出版社，2003年。

〔23〕王力后来承认，在中央告武汉人民书上，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前面，加了个“党内军内”；新华社揭发，康生和关锋在报道天安门广场集会的清样上增添了“揪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发〔1980〕77号文件附件一。1980年9月。

〔24〕张云生 张从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

〔25〕当事人王广宇回忆（2005年9月）。

〔26〕冲击徐向前，似为“清华井冈山”自发行为，冲击徐海东，是文革小组指示“北航红旗”做的。但是在1968年12中全会上，又组织了对于徐帅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720事件”。

〔27〕对文革冲突看成宗派斗争的怨言早就暗暗流传。空军的成钧1967年在一个检查里就承认自己把空军党委里的斗争，错误地理解成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四野整其他野战军的。

〔28〕莫里斯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445—4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29〕在毛泽东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来还对广州问题说要以旗派为核心大联合，“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2—3万人”；同日，对广西问题说：“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又批评两派抢援越军用物质。

〔30〕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308页，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31〕王力在反思支左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时，谈到“毛主席认为依靠军队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军队夺权，乱不怕，只要军队站在毛主席一边，听毛主席指挥，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乱……国家机器一旦被资产阶级掌握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人民武装也可以边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的政权的组织形式要保证人民武装不变质，人民解放军不变质，保证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武装，或者是武装的人民。……军队支左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很大，这历史的教训也很严重的。……首先他违背了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军党论，一贯反对的军队直接代替党这样的论点，着是个重大原则问题……这样势必走向毛主席本来主观愿望的反面”。参见《王力反思录》，848—851页。“反军乱军”待罪之身的王力，能够如此直截了当地谈文革教训，还是不敏感问题，实事求是的。



- 〔32〕周家鼎，“天欲坠，赖以拄其间”，见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499—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33〕一些部队同志至今觉得武汉的事件仅仅是策略性不够，授文革小组以反军的口实。
- 〔34〕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61—162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 〔35〕参阅周恩来在67—70年关于揭批“516反革命集团”的系列讲话。
- 〔36〕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有类似叙述：“他……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见原书240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
- 〔37〕《周恩来外交文选》，4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 〔38〕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234页，新天出版社，1997年。
- 〔39〕《毛泽东传（1949—1976）》，1505—15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40〕我们青年人在学习马克思正确对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运动、赞扬公社经验时，往往不知公社优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组成的。
-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4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42〕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89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 〔43〕1967年继任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认为：“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零事件’后心态的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心态写照”，是值得参考的。其前任王广宇也认为事态发展，到8月中旬，“毛泽东终于发觉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
- 〔44〕王力，《王力反思录》，1018页，北星出版社，2002年。
- 〔45〕徐海亮，《东湖风云录》，247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后来在8月9日接见武汉军区领导人时，林彪又讲到：“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许世友在内……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是类似的想法。
- 〔46〕邓毛毛的回忆，提到这次接见；但毛与邓最关键的话，涉及到毛、林、邓在文革中的微妙关系，她没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还是邓小平压根就没有给孩子谈。参阅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 〔47〕王力，《王力反思录》，1030页，北星出版社，2002年。

~~~~~

【往事回首】

江青为我改名记

• 杨银禄 •

从“文革”开始以后，到党的九大召开以前，江青很忙，看文件、送材料，到处参加会议、到处讲话，整整3年时间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步。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青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当上政治局委员，终于如愿地实现了她掌握大权的第一个目标。那个时候，她高兴得很，在北京尽情地享受生活，悠闲自得地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各个公园，还经常到外地休息消遣。她三进上海，三下海南，四去广州，还到过青岛、北戴河、天津、保定、大寨

等地。除此以外，她还在闲情逸致之中，给别人更改名字，并成了她一个不大不小的乐趣。她给很多人改过名字，如把张耀祠改成张耀词，钱浩梁改成浩亮，殷承宗改成诚忠，郭孟文（姚文元秘书）改成郭文，李子元（江青的司机）改成李元，常惠琴（人民大会堂的护士）改成常青，等等。其原因，不是说人家的名字有封建味道，就是说人家的名字离不开钱，有资产阶级的铜臭味，下面说说她给我改名的情况。

一

1969年8月的一天下午，江青在办公室看文件时，要给周总理送一份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她说：“小杨呀，这份文件很重要，怕丢失，我命令你亲自给总理送去，这件事你要办妥当，不许发生任何问题。”

我说：“请江青同志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看到那份文件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装着，用钉书机钉好，还用密封笺封好，信封上用上海生产的“中华”牌3B粗铅笔写着：“请杨银禄同志面呈总理。”落款：“江青托。”

她把文件递给我，我转身要走，她说：“你快一点把这份文件送给总理，越快越好，我一会儿到17号楼去休息，你送文件回来以后，到17号楼报告我。”

我说：“是，我现在就送去。”

我正要迈步走时，她马上说：“你等一下，我总觉得你的名字不好，太封建了，你的父亲满脑子的封建迷信思想，什么银银的？银，就是银锭呀，银币呀，银就是钱，他想的就是钱，赚钱、挣钱，他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是拜金主义呀。什么禄禄的？禄就是俸禄，高官厚禄，他不但让你追求钱，还叫你追求官位，这叫做追名逐利呀。个人主义思想在你父亲脑子里是蛮严重的。你的名字不好，很不好。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同时还是我们这个党支部的书记，我们共产党员做工作，应该是讲无私奉献的，既不追名，又不逐利，一点点私心杂念都不应该有，连个人的后代都不应该要，当了共产党员就不应该要自己的孩子，我生了一个李讷，就曾后悔过。主席喜欢小孩子，没有办法，也就要了。”

她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你让我想一想，看给你改一个什么名字好。”她用右手食指点了几下太阳穴，想了不大工夫就说：“这样吧，就用‘银’和‘禄’的谐音好了，叫‘英路’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叫你走英雄的道路。嗯，这个名字好，好，你以后就叫杨英路吧。”

江青这个人非常自信和武断，也不问问我同意不同意叫这个名字，于是，就把文件从我的手中要了回去，用剪刀把信封挑开，把文件抽出来，又拿了一个大信封，还是用那支粗铅笔写上：“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总理亲启。”落款：“江青托。”她重新把文件装进信封，封好，递给我，并说：“你看看，为了给你改名字，又浪费了我这样长的时间和精力，你快送去吧。”

我的“杨银禄”的名字已经叫了30年了，叫习惯了，从来也没有想过改什么名字，不想改，但是，又怕江青说我不识抬举，惹得她不高兴，因小失大。况且一个人的名字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只是一个人的代号或符号，以区别于别人，改就改吧，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没有说什么，接过文件就走了。

二

当日下午六时许，我来到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向阳厅），见到总理的外事秘书钱嘉栋同志。他很有礼貌地把我引导到总理的办公室。钱秘书向周总理报告说：“杨秘书给总理送文件来了。”

总理正在聚精会神地办公，看到我立即起身，伸手与我亲切地握手后，问我：“江青同志休息得还好吧，精神还好吧？”我说：“还好，总理。”

总理接过文件，端详信封上的名字，认真地说：“杨秘书，你的名字不是杨银禄吗？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吗？什么时候改成杨英路了。你以前叫过这个名字吗？”我认真地回答：“我是叫杨银禄，从来没有叫过别的名字，杨英路，是江青同志今天刚给我改的。”因为总理没有问为什么改名字，所以我也没有说江青给我改名字的理由。

总理略加思索后说：“江青同志给你改得好，好嘛。江青同志希望你走英雄的道路，好好。”

我说：“其实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江青同志叫改就改了吧。”

总理解释说：“江青同志今天给你改名字，说明她今天高兴，你还是不要扫她的兴嘛，杨秘书你说呢？”

我微笑着说：“总理说得对，我没有说不同意。”

总理也微笑着说：“那好，应该是这样，这样就对了。”

我问道：“总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我就回去了，江青同志还在钓鱼台17号楼等着我把文件送给总理以后马上报告她呢。”

总理说：“我这里没有事了，你可以回去了，请你转报江青同志，请她保重身体，也请你们工作人员精心地为江青同志服务好，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

我说：“也请总理保重身体。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主席、总理和党组织的希望。”

总理把我送出办公室，并大声说：“钱秘书，请你代我送送杨秘书。”

我回到钓鱼台，直接到了17号楼，看见江青正在礼堂休息室和大周打扑克。我走过去，蹲下跟她说：“江青同志，您叫我送给总理的文件，我已经亲自送总理了，请您放心。”

江青一边拿扑克一边说：“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总理跟你说什么来着？”

“总理请您保重身体，并指示我们工作人员为您服好务。他还说，您给我改的名字改得好，总理对我新名字的解释和您的解释是一样的，意思是希望我走英雄的道路。”我这样回答。

江青听了以后，哈哈地笑，说：“小杨，怎么样，英雄所见略同吧，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杨英路了，这是我给你改的，并且得到了总理的肯定，你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说：“对，是这样。”

三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天下午，江青叫我给毛主席送一封信。她在信封上写道：“请杨英路同志面呈主席亲启。”信封的左下角写有“江青托”三个字。

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联系，问主席现在在什么地方。当我得知主席在人民大会堂 118 办公，并同意我“现在可以来”，我放下电话就出发了。到了 118，徐业夫同志在门口等着我。我当时真是有点胆怯，怕见到主席不知道说什么好。以前我曾多次见过主席，但那时周围都有不少人在场，可这次只有我一个人，不敢进 118 的大门。我就从文件包里取出那封信，对徐秘书说：“徐秘书，请你给主席送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拜托你了。”徐秘书看过信封对我说：“小杨，这怎么行呢？江青同志清清楚楚地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主席亲启，她是托你，不是托我。江青同志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呀，她叫你面呈主席，你必须亲自交给主席，我是不能代劳的，否则，以后出了什么事，我说不清楚，还是你送进去。”我看徐秘书的态度很坚决，说得也有道理，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我引导到主席的办公室门口，两次示意叫我进去。这是我到江青那里工作以后，第一次进入主席的办公室，第一次一个人最近距离地见到主席，真有点发憊，但是，不进去又完不成任务，就壮着胆子，硬着头皮进去了。

我看到主席坐在一个旧式的大沙发上，专心致志地看文件，我怕惊吓主席，就脚步轻轻地走到主席的右前侧，低声咳了两声并问道：“主席好。”

主席听到说话声，转过脸来，看着我。我怕主席不认识我，就主动介绍说：“主席，我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杨英路，江青同志叫我给主席送信来了。”

主席说：“你好哇！你是小杨，我去年在钓鱼台江青那里见过你。”他说着话把信接了过去，指着信封上我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你的名字是木易杨，英雄的英、英俊的英，道路、走路的路。”他抬起头来问我：“你的姓氏后边两个字好像不是这两个字吧？”

我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以前叫杨银禄，银行的银，福禄的禄，现在我的名字是江青同志一个月前给我改的。”

主席又问：“她为什么给你改名字啊？”

我回答：“江青同志说我原来的名字太封建，所以才给我改成现在的名字，意思是叫我走英雄的道路。”

我原来紧张的心情，经过主席和我的一问一答，不怎么紧张了，轻松多了。

主席听了我的回答，没有说我的名字改得好还是不好，把信又递给我，诙谐地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给我拆开它。”

我说：“好。”我是左撇子，右手拿着信封，用左手的大拇指甲把书钉抠掉了，将信又递给了主席。

主席看了看我，问道：“你没有用剪刀，是用什么把信封拆开的呢？”

我说：“是用手指甲抠开的。”

主席高兴地说：“你的指甲蛮厉害的嘛。”

我说：“我经常用指甲抠钉书钉，习惯了。”

主席说：“看来你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呀。”

我看见主席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开始看信了，就说：“主席如果没有事了，我就回去了。”

主席微笑着说：“你已经没有事了，我还有事，请你回去吧，再见了。”并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叫着我的名字：“杨——英——路同志。”

由于江青非常难伺候，她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百般刁难，进行种种迫害，我们对她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对于她给改名字的事，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什么光荣和有什么意义。但是，“英路”二字的含义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肯定和敬爱的周总理的赞成，还是觉得蛮高兴的，也就把杨英路的名字叫开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江青改了名字的同志，大部分又改叫原来的名字。当然，我也改叫了原来的名字。

□ 《党史博览》2006年第5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